

# 国际发展格局中的中国模式

郑永年

---

**摘要:**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成功, 国内外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日渐增多。然而, 大多数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模式时, 往往会回避中国的政治模式, 仅仅把中国模式局限于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功。但实际上, 如果不讨论中国的政治模式, 就很难理解中国的经济模式, 因为到目前为止, 中国的经济模式正是由中国的政治模式促成的。对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 如何建立稳定的政治社会秩序是其面临的艰巨挑战, 对此, 中国模式的政治和经济内涵都非常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 中国模式 政治模式 经济模式 社会改革

作者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

## 中国模式的价值

中国模式的崛起可以说是 21 世纪国际发展的一件大事。中国模式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产物。因为改革开放包括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这两个互相依存的方面, 讨论中国模式就应把改革开放置于中国和国际发展这两个维度中去探讨其意义。中国模式不仅属于中国历史, 也属于世界历史。

要想探寻中国改革开放对世界的意义, 就要从国际环境的变化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开放”表明中国的改革一开始就是世界发展经验的组成部分。中国改革开放对世界的意义, 在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 其含义是不一样的。这可以从西方世界的一些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话语变迁中看出来。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 在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 西方社会对中国是一片赞扬之声, 认为改革开放会使中国很快演变成成为另一个西方式国家。但当他们最终意识到中国不可能成为另外一个“他们”的时候, 西方就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中国威胁论”。从“中国军事威胁论”到“中国经济威胁论”再到“中国政治不确定论”等等, 循环反复, 从未间断过。当然, 跟随着各种威胁论的是各种应对中国的策论, “围堵”、“遏制”、“抗衡”、“对冲”和“接触”等等, 不一而足。当他们意识到中国的崛起不可遏制和围堵, 意识到中国事实上已经崛起的时候, 西方又抛出了“大国责任论”和“利益相关者”论等等。<sup>①</sup>

---

① 对 20 世纪 90 年代盛行于西方的各种“中国威胁论”的讨论, 见 Zheng Yongnian, *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a: Modernization,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另一方面, 也有很多人预测中国的解体, 例如 Gordon G. Chang,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1.

中国模式问题在西方已经讨论多年。尽管中国政府本身一直很低调，但海外对中国模式的讨论仍然有增无减。基本上，中国模式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不同的意义。对很多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模式的意义在于其到底是否能够成为有别于从前其他所有现代化模式的一个替代模式。二战后，世界的发展模式基本上分为苏联模式和西方模式。现在苏联模式已经解体，只剩下西方模式。西方模式主要指的是美国模式和欧洲模式。美国在冷战结束后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有力量推行其模式，即人们所说的“华盛顿共识”。欧洲国家也经常在国际事务中倡导其价值和模式。在很多方面，欧洲正在和美国区分开来，努力寻求自己的模式。很显然，在内政方面，欧洲的社会主义因素远较美国多。但不管是欧洲还是美国，在推行其模式方面并没有很大的成功，很多采用西方模式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因此而得到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政治的稳定运作。在这种情形下，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具有了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如果说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多的是发展经验问题，那么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来说则更多是一种价值问题。对很多西方人来说，中国模式就是对西方价值的挑战和竞争。他们的担忧不仅仅出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经验的极大兴趣，因为即使在西方，那些对美国和西方模式不再感兴趣的西方人也开始看重中国模式。前些年所谓的要以“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的讨论就是起源于西方，而非中国。<sup>①</sup>

中国模式对中国发展本身的意义更不容忽视。中国模式尽管指的是改革开放的经验，但也应当看到，如果不理解改革开放前30年的历史，就很难甚至不能理解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前30年的发展经历了一些曲折，但也为后30年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因此，中国模式的范畴应当涵盖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的60年。对中国的大历史来说，改革开放最深刻的意义在于对国家发展道路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道路的探索。中国在近代之前尽管历史漫长，但多为历史的简单重复，农业社会和王朝更替是数千年历史最持续的特色。只有到了近代和西方强国接触之后，中国在各方面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简单地说，从清末改革运动到孙中山再到毛泽东，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一直处于持续的革命之中，革命领袖们探索的重点在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尽管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最终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但对共和国应当是怎样一个国家一直处于长期的探索之中，对很多问题的理解只能在实践中进行。“继续革命”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前30年共和国历史的主线条。

在前30年，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中国尽管也有些制度上的创新（如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和苏联决裂），但总体上还是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中国仍然孤立于（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国际体系之外。前30年为一个主权国家独立奠定了基础结构，但对如何建设这个新国家，前30年在为后人留下很多宝贵经验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如果没有前30年建立起来的主权国家架构，也很难有后30年的建设成就。正是因为有毛泽东那么多充满价值的社会实践，毛泽东后的中国领导人才有了全然不同的探索。正因为计划、集权、没有自由、封闭、贫穷的社会主义已经被证明为行不通，才使得无论是领导层还是中国社会普遍接受并追求市场、分权、自由、开放和富裕生活等价值。尽管邓小平当时形象地说改革开放是

① 最早把“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相对的讨论见 Joshua Cooper Ramo, *The Beijing Consensus*, London: 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 2004. 作者认为“北京共识”可以取代“华盛顿共识”。之后，在中国有很多讨论，例如黄平、崔之元主编：《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摸着石头过河”，但这只是说追求这些价值的过程具有不确定性，但实际方向是相当明确的。这也是为什么在各种困难面前，例如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的解体，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没有走回头路的主要原因。

中国对发展道路的选择也并非“非此即彼”，就是说并不是在告别了苏联模式之后，就去选择西方模式。这方面中国又和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区分开来。应当说，这种独立探索本身就具有重大价值。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接受西方发展模式，希望通过激进的改革，变成西方国家，但大都导致了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以俄罗斯为例，在其进行休克疗法的激进改革之后，俄罗斯在一段时间里赢得了西方的高度赞扬。但不久俄罗斯就发现无论是西方式市场经济还是西方式民主都很难适应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发展。直到普京的改革，俄罗斯才开始纠正激进改革的弊端。但普京改革被西方视为走回头路，西方对俄罗斯又出现一片责难之声。经过诸多曲折之后，俄罗斯各界才意识到，尽管民主政治是一种值得追求的价值，但民主不能保证社会经济的发展。如果民主不能同时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就会导致社会不满，从而威胁政权的合法性。

尽管改革开放这短短30年从数字上看对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国并不算什么，但把它置于中国历史的过去和未来之中，人们会感觉到这30年具有里程碑式的历史意义，就是说这30年为历史的长河注入了从前所不曾有过并且注定会对未来产生深远影响的因素。尽管数千年的历史很长，但这样的历史时刻并不多见。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这30年已经成为历史连贯中的重要一环。中国模式的崛起不仅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对世界的发展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具有借鉴意义。尽管在学术界和政策研究领域，人们对中国模式的兴趣浓厚，但到目前为止，除了媒体对中国模式概念的传播，还没有严肃的学术研究。很显然，对中国模式的认识需要很长的时间，花费很大的努力。本文主要想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对中国模式做些探讨。

## 中国的政治模式<sup>①</sup>

在讨论中国模式的时候，大多数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往往会回避中国的政治模式，而仅仅把中国模式局限于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功。但实际上，如果不讨论中国的政治模式，就很难理解中国的经济模式，因为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经济模式正是中国的政治模式促成的。对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何建立稳定的政治社会秩序是这些国家面临的艰巨挑战，对此，中国的政治模式非常具有借鉴意义。本文主要从五个方面来讨论中国的政治模式。

### 1. 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

国际学术界和政策圈一直流行着“中国只有经济改革而无政治改革”的看法。<sup>②</sup>这种说法事实上是人们对中国模式的认识难以深入的重要根源。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如果没有政治改革，很难想象经济发展成就是如何取得的，也很难解释当代中国政治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政治之间的巨大区别。认识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定义政治改革。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首要的任务就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国家制度建设就是中国过去将近30年政治改革的核心。中国

① 关于中国的政治模式，笔者曾在《国际发展视野中的中国经验》一文中详细论述。参见郑永年：《国际发展视野中的中国经验》，《开放时代》2007年第4期。

② 这种说法在理论上首先由Susan L. Shirk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之后在学术界流传开来。见Susan L. Shirk,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Berkeley, L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把改革分成不同的阶段，在每一阶段，各方面的改革优先次序不同。简单地说，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中国改革的主轴就是经济改革。自中共十六大（2002年）以来，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以社会改革为主体的改革阶段。中国还没有进入一个以政治改革为主体的改革阶段。这个阶段什么时候到来要取决于社会改革和进一步经济改革的进展情况。

## 2. 经济发展需要一个最低限度的社会政治秩序

没有一个最低限度的社会政治秩序，正常的经济活动就很难进行。秩序是资本和商业活动的基本条件，尤其对吸引国际资本更是如此。自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以来，中国在吸引外资方面一直在发展中国家处于领先地位，这与中国稳定的社会秩序有很大的关联。很难想象在社会失去秩序的情况下，外资还会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

## 3. 经济发展需要有效的产权保护

产权保护关系到投资者的积极性问题。如果没有产权保护，就没有动力机制。问题在于用什么样的机制来保护产权？这一点中国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国家有不同意见。西方国家特别强调用法治来保护产权。事实上，中国的产权保护主要是通过政治和行政手段来进行的。在法治没有建立起来或者法治不能有效运作的情况下，如果要追求经济发展，通过政治和行政手段来保护产权变得不可避免。

## 4.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基本社会正义

基本社会正义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一旦社会缺少基本的正义，那么社会不稳定甚至无秩序就成为可能。中国经济发展在给人民带来很多好处的同时也导致了很多方面的社会正义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没有经济发展就不会有社会正义。但经济发展并不等同于社会正义。关键在于当出现社会非正义的时候，是否能够采取有效的方法来纠正问题。

## 5. 民主化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结构

到今天，很少有国家及其人民不想发展民主政治的。但在很多场合，民主则是可遇不可求的。发展中国家并不缺乏民主化的经验，但并非所有的民主化经验都是积极的，有“好”民主也有“坏”民主。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关键的问题并不是要不要民主的问题，而是如何追求好的民主而避免坏的民主。中国的经济发展还处于早期，中产阶级规模还不很大，穷人还很多。如何解决穷人的问题是中国面临的主要任务。

# 中国的经济模式

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模式构成了考验。和其他很多国家比较，中国的经济制度表现出相当高的应对能力，无论在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方面还是在应付危机所使用的方式方面。而中国经济制度的能力和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建立起来的中国经济模式有紧密的关联。从经济上看，可以把中国模式称之为复合型或者混合型经济模式。这里使用“混合”这个概念和人们平常所说的不太相同。一般说来，混合经济指的是中国经济的混合所有制模式。这里使用的概念范围要比所有权广，包括很多方面，在所有权之外，混合模式也包括对外开放和内部需求之间的平衡，政府和市场两者在经济领域的作用的平衡等等。

## 1. 混合所有权制度

在应付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国有化已经成为西方各国政府采用的一种手段，至少对金融银行部门是这样。欧洲的国有化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实际上，国有化是欧洲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二战后，很多国家的国有经济部门曾经变得非常之大，导致了经济效率和效益低下。这就导致

了反向运动，即私有化。英国政府在撒切尔任首相期间曾经试图发动大规模的私有化运动，并对欧洲各国产生影响。但是即使是撒切尔的私有化运动也极其有限，仅限于几个实体经济部门。在涉及公共利益就是说那些提供公共服务或者福利的部门，私有化运动遇到了来自民主政治的很大阻力。这主要表现在教育、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方面，因为这些部门涉及全体人民的利益，人们用选票否决和抵制了私有化运动。现在欧洲面临危机，各国政府又开始诉诸于国有化，对此欧洲社会并没有出现反对声音。

值得注意的是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也开始出现了各种变相的国有化运动。美国是私人资本主义的典型代表和大本营。在很长时间里，美国是抵御公有化尤其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力量。在学术方面，以私有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就在美国生长并拥有了向外的扩张力。在政治上，新自由主义最典型的表现就是里根经济学。但是，今天像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那样可以称之为原教旨主义式的新自由主义人物也开始认为，并提倡国有化可以成为应付危机的有效方式。

在发展混合型所有权方面，中国比较典型。在改革开放前，中国从经济管理方式来说是典型的计划经济，但从所有权来说已经呈现多种形式，有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农村还有少量的私有性经济活动，主要表现在农民的自留地上。在国家所有制内部也存在着不同层面的所有权，即实体经济或者企业由各级政府分别所有和管理。

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引入和鼓励其他多种形式的所有制形式，包括民营、合资、外资等等。在俄罗斯和东欧原来的共产主义国家，因为深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进行了以私有化为核心的急风暴雨式的经济改革。但中国并没有这样做。中国一方面鼓励其他所有制的产生和发展，另一方面通过改革原先僵化的公有制来适应新的环境。国家所有制原来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并在宪法和法律方面得到保障。在改革的早期，国家所有制为主，其他所有制为辅，仅作为补充。但后来各种所有制得到了平等的法律地位。这里尤其要提及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之后“抓大放小”的经济改革。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改革方案。通过“抓大”，中国重组了大型企业；而“放小”则是通过民营化给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动力机制。<sup>①</sup>

中国的混合型或者复合型所有制已经形成，并且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障。这种所有制结构应当不会轻易改变。这种混合型经济在应付金融危机过程中显示出其优势。国有部门已经成为中国政府强有力的经济杠杆，成为其应付危机的政策工具。西方多数政府只有金融工具而无经济杠杆，而中国政府两者皆有。

## 2. 出口导向和内部需求

金融危机发生后，一些西方学者和政治人物把责任推给中国。在这些人看来，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增长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模式与早先的日本和后来的“四小龙”有很多类似之处，都是出口导向型的。外向型经济增长依赖于出口，依赖于西方市场。同时，中国的金融体系也是为外向型经济体系服务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创造了大量的外汇，再用外汇购买西方的诸多金融产品。在过去 30 年里已经形成了中国生产、西方消费的模式。这个模式被西方一些人视作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尽管这些指责并没有多少道理，但却值得中国思考。这次危机告诉人们，无论是要解决危机还是要长期发展，都不能依赖于西方市场，依赖于西方消费者。中国的发展还必须主要靠自己，就是说要建设一个内需型经济体。一个内需型的经济体并不是说不要外贸和出口。但一个高度依赖于外贸而内需不足的经济体，其增

<sup>①</sup> 见 Zheng Yongnian, *Globalization and State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New York 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Chapter 4.

长是不可持续的。在全球化环境下，内需和外贸是两个最为重要的经济支柱。对中国这样大的经济体来说，内需无疑要比外贸重要得多。

中国这次之所以能够抵御源于西方的危机，表明中国的经济形态与日本和“四小龙”不同。无疑，这次金融危机表明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出现了问题。因为西方没有了需求，依赖于西方市场的实体经济必然出现问题。人们已经看到在珠江三角洲有大量的工厂倒闭和大量的工人尤其是农民工失业。珠江三角洲的经济正在面临很大的困难。出口导向型经济要转型，这是很显然的。然而，转型并不是说要否定出口导向。在中国内部，出口导向型经济也表现为不同类型。比较一下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就可以看到这一点。珠江三角洲的出口导向型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自由放任”型经济。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地方有关部门对本身的产业发展没有长远的政策，只要是外资就受到欢迎。因此，低技术、劳动密集、高能源消耗、高污染等成了珠江三角洲经济的特色。这种经济增长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显示出其不可持续的特点。例如，它不能承受劳动关系的变化。中国新出台的劳动法对珠江三角洲资本方就产生了负面影响。这种方式也不能承受土地方面的变化。当土地的供应不能持续时，这种发展模式也会遇到很大的麻烦。正是这种情况促使广东地方政府在近年来开始努力调整产业政策。甚至在这次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广东省政府已经开始进行产业的升级调整。广东的一些企业在金融危机之前就开始关闭或者倒闭。广东称这一步是“腾笼换鸟”。这种做法受到一些方面的质疑，尤其是来自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的质疑。但是，无论从产业升级还是劳工权利或者可持续发展来说，这一步必须走。所不幸的是，这种产业调整遇到了现在的金融危机。不管怎样，很多国家的产业调整和升级都经历过一个痛苦和漫长的过程，中国也不会例外。

和珠江三角洲相比，长江三角洲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在大规模吸收外资方面，长江三角洲可说是后来者。或许接受了珠江三角洲的教训，长江三角洲在规划发展过程中，政府一直起非常大的作用。长江三角洲从一开始就拒绝低技术和高污染的产业。从各个经济指标来看，长江三角洲的发展要比珠江三角洲更具有优势。尽管这次金融危机也影响到长江三角洲，但其受影响程度显然远远低于珠江三角洲。

更为重要的是，除了出口导向型经济体，中国也有很多地方发展出了以内部需求为导向的经济体。浙江模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sup>①</sup>浙江模式可以说是一种内生型发展，就是说，发展的动力来自内部。在中国沿海从珠江三角洲到长江三角洲再到京津唐和渤海湾地区的很多地方，经济发展的主动力来自外来资本。浙江则没有这样的情况。尽管外资也得到鼓励，但发展的主动力主要来自民族资本。在过去的30年间，民族工业得到长足的发展，足以和外来资本相抗衡。发展的资本来自内部，发展也是以满足内部市场为主。浙江的产品都是以先抢攻内部市场为主，出口为辅。这与很多沿海地区高度依赖出口导向型经济形成鲜明对照。浙江是以开拓内部市场闻名的。在全国各个角落，没有一个地方没有浙江商人。这种以满足内部市场为主体的发展模式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同时这种模式要比出口导向更稳定、更具有可持续性，因为它更能承受外部国际市场的冲击。

浙江经济基于民营资本之上，其技术创新能力也比其他地区要高出很多。在20世纪80年代，浙江的一些地区尤其是温州地区以生产假货闻名，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完全改观。在吸取了以往的经验之后，浙江民营企业非常重视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因为是民营资本，浙江企业的技术创新更具有自主性。现在的浙江商人不仅走遍全国，也走遍全世界。很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

<sup>①</sup> 郑永年：《浙江模式值得深思》，新加坡《联合早报》2006年7月4日。

具有相当的竞争能力。近年来浙江产品在发达国家经常遭受地方贸易保护主义的“反击”，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浙江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但同样重要的是浙江健康发展的国有企业。在中国的其他地区，国有企业的发展一直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但浙江的国有企业发展势头相当好。这与民营企业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民营企业的发展为国有企业营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两者相互补充又相互竞争，起到了共同发展的效果。

更值得注意的是，浙江的劳工状况远较其他地区好。在一些地区尤其是合资、港资和韩资等密集的地区，劳工状况存在着太多的问题，劳工的权益往往得不到保障。但在浙江，侵犯劳工权益的情况并不多见。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有多种，但这与浙江重视本土资本有关。外来资本主要动机来自对地方廉价劳动力的利用，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很难产生。而本土资本则因为受地方归属感等因素的影响，往往较能注意企业社会责任的培养和发展，劳资关系也因此显得比较和谐。

浙江当然不是唯一的以内部需求为导向的地方经济体。中国的很多地方也是这样。山东是另外一个例子，出口经济在总体经济中的比例很低。最近这些年出现的“重庆模式”也是通过扩展内部需求得到高速发展的。从地方发展经验来看，在中国模式这个总体概念之下，实际上呈现多种模式并存、竞争、发展和融合的态势。这也是中国经济模式的最大特点。

### 3. 政府和市场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既关乎一个经济体是否会导致经济或者金融危机，也关乎这个经济体是否有能力应付危机和预防危机。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再次成为各国政府和学术界的讨论议题。不管这次金融危机背后有怎样复杂的原因，就政府来说，最主要的是政府对金融系统监管不严。新自由主义者把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即市场，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相信这只手会解决一切经济问题。在新自由主义那里没有政府的经济功能。如果说有，那么就是要保证这只看不见的手毫无障碍地运作。但这次金融危机表明这种信仰的差错。

中国在改革开放前是计划经济，把政府的经济作用极端化，市场被视为属于资本主义制度，从而其功能也被否定。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市场有了不同的看法。邓小平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利用市场，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市场。这就把市场中立化了。同时政府大力推进市场建设。上面所说的各种所有制经济都是在同一个市场平台上互动竞争的。

重要的是，中国在强调市场功能的同时没有走向市场万能主义。崇拜市场的新自由主义在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但在政策面不同领域有不同的影响。在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根基可以说在实体经济领域，即在企业界。但在中国则不同。新自由主义进入中国之后，在实体经济尤其在大型国有企业领域遇到强大的阻力。如上所说，中国政府重组了大型国有企业，民营化并没有发生在大型国企。但新自由主义对中小企业的的影响相当大。一方面是因为“放小”的战略。尽管这个战略设想得很好，但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主要是恶性私有化和国有资产的流失，导致了社会的不正义。新自由主义对社会制度改革的影响更大，主要表现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教育领域。在西方，因为民主制度的存在，新自由主义在这些领域遇到了强大的阻力，即被人民所否决。在中国则相反。在国有企业领域，因为有国家力量的存在，新自由主义不能发生作用。但在社会制度领域，新自由主义如鱼得水。原因很简单，因为社会制度的存在主要是为了弱势社会群体。弱势社会群体很难抵制新自由主义的侵入。在这些社会制度领域，改革开放前30年里中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新自由主义进入这些领域以来，原来的社会体制包括学校、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制度全面衰落甚至解体，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尽管近年来政府尽了很大的努力进行社会制度建设，但到今天这些社会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

在新自由主义影响深刻的领域，政府管制的作用很难发挥。因为政府全面撤退，市场恶性竞争变得不可避免。中国企业间的恶性竞争是这些年企业界丑闻不断的主要原因。恶性竞争表明市场还是不规则。市场的规则化很难靠市场本身解决。从中外历史的经验来看，政府必须在建立市场规则方面扮演主要角色。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发生、发展和健康运作离不开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

这种情况表明，中国迫切需要建立一个规制型国家。在金融银行领域，中国规制国家初步成形。中国金融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已经具备应对危机的良好基础。在金融和银行领域，中国规制国家的建设得益于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产生于亚洲一些国家金融监管不严。中国从亚洲金融危机开始致力于金融银行系统的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就是这次中国金融和银行系统没有发生像西方那样深刻危机的主要因素。西方各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之时，批评亚洲国家，给亚洲国家带来很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也是促使中国改革的一个因素。但是，西方国家本身则忽视了改革，最终造成今天的危机。尽管西方国家可以强调一些外在的因素（如中国的高存款率），但推卸不了内部监管不严的责任。很显然，不管外部因素如何，危机是通过内部因素发生作用而爆发的。

## 中国模式的改进

2009年，温家宝总理在剑桥大学演讲时强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是一个“学习国家”。这里的“学习”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指的是中国向世界各国学习。中国虚心学习国际经验，不管是像美国那样的大国还是像新加坡那样的小国，中国愿意学习其长处。可以说，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好学的国家。尽管很多国家尤其是西方经常对中国持批评态度，但这并没有影响中国向这些国家学习；另一方面，“学习”也指中国向自己的经验学习。中国向各国学习，这里有积极的经验，也有负面的教训。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并非十全十美。中国模式是一种发展中的模式，是世界经验和中国本身经验的累积。中国模式的进步对中国和世界同样重要。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虽然显现了其优势，但也表现出一些弱势。不管怎样，中国模式仍然处于发展过程之中。如果能够从本国和国际以往的经验中学到足够的教训，那么非常有利于这个模式的发展。

在社会改革成为主体改革的今天，中国模式的改进关键在于通过社会改革而确立社会制度。社会改革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首先，社会改革是为了应付和解决经济改革所带来的负面结果。改革开放30年，经济主义可以说是中国发展的主题，经济发展就是一切。中国在短时间里，创造了世界经济史的奇迹。此前，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帮助数以亿计的人民脱离贫困状态，帮助这样大规模的社会群体提高生活水平。但经济主义在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各级政府GDP主义盛行，非经济方面的发展大多被大大忽视，导致环境恶化，资源大量浪费，贫富差距扩大和严重社会分化。这些由经济发展导致的后果，加上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群体事件越来越频繁，多数表现为各级政府和社会的对立。很显然，经济主义的后果不加以纠正，经济发展就不可持续。这一点毋需多说。这些年来中国政府确定的“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就是对这种单向面发展的反思。

其次，社会改革要为未来经济增长奠定新的制度基础。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增长总体上来说源于经济制度的改革和创新。但迄今，经济改革的很多方面已经很难深入下去，这说明过去的增长模式已经达到了顶点。进行社会改革和建设社会制度的目标是推动中国从一个非消费型

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型。消费型社会是中国未来长期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来源。很简单，经济增长有两大来源，即投资和消费，而投资的最终目的也是消费。中国在过去 30 年里建立了一个外向型经济。增长来自投资，但投资是为外部市场服务，主要是西方市场。如上所说，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发生，来自西方的需求遽然下降，中国这种发展模式的局限性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中国要向消费社会转型，就必须建立一整套有助于消费社会发展的基本社会制度，例如医疗保险、社会保障、教育和环保等等。没有这样一套制度，就没有可能出现消费社会。

其三，更为重要的是社会改革要为中国未来的主体性政治改革做制度准备。前面已经讨论过，中国的改革进程大致可以分为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政治改革三个阶段。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的政治发展进程应当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在先，民主化随后。<sup>①</sup> 民主制度的有效运作不仅需要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更需要诸多基本国家制度成为其基础结构。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凡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得好的国家，民主化过程比较和平，新建立的民主制度能够有效运作。反之，在缺乏基本国家制度的情况下，如果进行民主化，就会出现无政府状态、社会不稳定和政治恶斗。现在，亚洲很多国家所经历的民主危机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在过去 30 年中，中国已经建立了一套基本的国家经济制度，但社会制度则远远没有建立。如果在基本国家制度中缺失社会制度的情况下进行政治民主化，必定出现动乱频繁发生的政治局面。

金融危机的确为进行社会改革和建立社会制度提供了好机会。中国迫切需要在危机中继续寻求新的模式。努力的方向和重中之重应当是扩大内需，建立消费型社会。在任何国家，社会改革和建立社会制度都是一场攻坚战。在当今发达国家，社会制度的建立往往和持久的充满暴力的工人阶级运动，甚至革命联系在一起。从原始资本主义转型到现代福利型资本主义，并非资本逻辑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社会改革的结果。一些国家的政治精英能够实行“铁血”政策，超越既得利益，进行自觉改革，但另一些国家的政治精英则受制于既得利益，没有能力进行改革，结果导致暴力式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发生。有一点很明确，到现在为止，所有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一套良好的基本社会制度都是保障其市场运行和社会稳定的制度基础。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政治改革也在产生其动力机制，因为只有通过有效的政治改革，这些社会制度才能建立起来。

〔责任编辑：张飞岸〕

① 有关“国家制度建设在先、民主化随后”的观点，见郑永年：《政治改革和国家建设》，《战略与管理》2001 年第 2 期。

---

---

**ABSTRACTS**

**The Emerging Chinese Model of Development (1949-2009) : From the Global Perspective  
Adhering to the Right Direction and Exploring New Paths : Reflections on Sixty Years of Socialist  
Practice in China** *Wang Shaoguang ° 4 °*

To examine the directions and developmental process of China's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t a time when the Chinese economy is growing rapidly despite the current world economic crisis is an act of no ordinary significance. Broadly speaking, China's sixty years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hases : the first thirty years from 1949 to 1979 and the second thirty from 1979 to 2009. The first thirty years of China's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of the next thirty years, a period in which China's continued exploration of new directions led to spectacular achievements. History teaches us that the linchpin of building socialism is not whether you have a detailed blueprint for socialism, but whether you have a grand vision for understanding socialism and the courage to direct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lthough China today faces many problems and even grave challenges, we will open up an ever wider path for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o long as our country adheres to the direction of socialism.

**The Chinese Model of Development :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Zheng Yongnian ° 20 °*

With the success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increasing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Chinese model of development both in China and abroad. However, in studying the Chinese model, many scholars, particularly Western ones, have avoided studying China's political model. Instead, they have conceptualized the Chinese model of development as a matter of purely economic success. In fact, however, it is extremely hard to understand the Chinese economic model without discussing the Chinese political model, because it is China's political model that has driven the success of its economic model. Many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face the grave challenge of building a stable political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the Chinese model of development provide a valuable lesson in this respect.

**China, a Country in Rapid Development : Commemorating the Six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ith a Look at Prospect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M. Ji. Titarenko ° 29 °*

China today has reached a level and stage of development that make it impossible to halt reform and modernization. The process is already irreversible. Though the way ahead is beset with difficulties, the country must continue her forward advance. The formulation of the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with its focus on people, clearly indicates that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begun to devote more attention to the human factor, thus giving an answer to those who allege that China violates human rights. The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offers a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theory designed to solve the problems that have emerged in the course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It represents a new phase in the adaptation